

# 认知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林克勤

(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认知传播学以新技术语境下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学理革新与认知转向为己任,直接承续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与核心,观照并审视了康德与黑格尔的理性批判和辩证法体系,以及卢卡奇、梅洛·庞蒂、雷科夫和约翰逊的现象学逻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综合运用总体原则、批判视阈、问题导向、主体拟构和诉诸自然的方法论去分析和探索人类精神交往的复杂现象和深层问题,以期实现对其多样性、变异性与规律性的认知与把握。

〔关键词〕认知传播学;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4.012

认知传播学把唯物主义指向的体验观奉为人们认知世界、进行精神交往的前提,以人类心智对各种信息的个性化加工作为社会传播的必然先验,其体系核心其实上溯于雷科夫和约翰逊的体验哲学、梅洛·庞蒂创始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卢卡奇隐现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观点以及对这几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其指导方针是以唯物论、历史观和人本主义立场去看待和分析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从中探索、比较、鉴别、论断与人类心智活动密切相关的精神交往机制和内在结构谱系,以期实现新语境下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学理革新与认知转向。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承续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范畴的灵活转化与实践运用,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

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sup>〔1〕</sup>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紧密相连,既认同笛卡尔所强调的可靠的方法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他对现代科学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又扬弃了其局促偏执的、基于“知识之树”而确立的形而上学优先论,最终以实践—生存—认知—改造的历史辩证理论体系引领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革命。

## 一、总体思维

认知传播学在审视看待人类社会中的精神交往现象和条分缕析其折射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坚持一种总体的、宏观的、系统的和超学科的视界。这是因为资讯与科技的高度发达使得现存

社会问题与现象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学科精细化分类的狭窄看向,倒逼我们迈向一种更为辽阔、高远的世界图景构建与运行思路。仅靠传统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格局规设与理论张力已无法彻底解释、评说纷纭的社会精神交往活动,合理运用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等超学科的诊断与逼视,将最大可能地弥合传统学科分类带来的互相割裂与彼此倾轧的鸿沟,一定程度上避免认识与研究的碎片化趋势,在方法论上立于一种更为超脱和包容的境界与立场,进而实现对人类精神交往一般问题、现象和规律相对比较全面的认知与把握。

总体论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原则,即如学界公认的那样,马克思是站在总体性的视角下来全面分析和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毕生致力于从如何获得人类解放的普遍立场上去发现、探索、确证推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资产阶级作为私有利益和财富追求者的角色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成为历史的普遍阶级,无法成为总体性的行为主体,因而其对其他阶级的利用、剥削以至压迫就不可避免,这必然导致一种逼仄短视、倾向明显的认知偏移。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其物质意义上的一无所有,就无需也不可能从拥有某些东西的角度来了解世界,他们才有可能从总体论的角度来认识世界、描述世界和解释世界。<sup>[2]</sup>马克思强调从全息的角度去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sup>[3]</sup>在这样的总体原则指导下,马克思看到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他的关键范畴与理论题域总是跨学科的、交叉的和互融的,涵盖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传播学的多学科领域。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坚持一种总体

的思维和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它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去处理问题。”<sup>[4]</sup>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他认为客观事物不但作为矛盾而存在,而且作为系统而存在,所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必须具有系统的观点、全局的视野,始终做到高屋建瓴、把握整体。在剖析深化改革这一理论题域时,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sup>[5]</sup>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论的中国化运用,即站在宏观的层面、统揽的立场、全局的高度,去面对纷繁多样的问题与矛盾,在社会一般规律的引领下去推进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

在这样的总体思维指向下,认知传播学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即囿于人类的认知能力以及各种因素(情感、立场、阶层、权力、知识、认知图式等)掺合的影响,传播主体对客观事实的把握总是不全面的。在浩瀚的万物面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与了解无异于是盲人摸象,往往只接触和知觉到人类心智和现有科学技术手段可以探索到的那部分事实,而对隐藏在冰山下的绝大多数潜在事实难以发现。因而,传播主体能够发掘与分享的事实与存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要尽可能全面地探触和认知世界就必须要从自然域与人类社会的总体性联系上下功夫,从历史与现实的多样化勾连上去确证。从这一点出发,要解决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离开了对社会的总体了解,离开了社会对个别、特殊的强大制约作用,那就必然会陷入空想和臆造,而这正是总体性思维方法的力量所在。<sup>[6]</sup>因此,“关系中的事实(reality

in relations)”)将成为信息过载、知识爆炸时代的主流认知框架,而要接近事实真相则必然要具备宏大高远的视野和各学科知识的大融通,这也是新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对总体性方法的呼唤与要求。在爱德华·威尔逊的叙事中,21世纪势必寻求知识的融通,这种融通不仅将重整日渐瓦解的人文学科,重新掀起人们对于非功利性的艺术、人文、道德的热情,而且也将唤醒日渐机械化、技术工具化的科学的活力。他认为,无论是环保问题、区域贫困、人口增长并因此带来的资源短缺、堕胎,乃至地缘冲突、种族纠纷、意识形态纠葛,都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人文知识的融通,才可能寻求有意义的解决方案。<sup>[7]</sup>

## 二、批判视阈

批判性是自康德以降西方近代哲学的传统,康德以其经典的三大批判文本奠定了一个“批判的时代”,而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虽然借助密涅瓦身边的猫头鹰黄昏时的起飞,结束了康德把上帝这一超验的东西排斥出理性之外并束之高阁的独断专行,但其大肆褒扬的绝对精神、绝对理性的思辨哲学却成为了安放神学垂死之躯的最后避难所。在其自我设定和精密规划的理论体系中,他所推崇的怀疑、审视、发问、诘难、诟病、鞭笞、研究、探索……,由于缺少了人的实践的强力支撑,这些哲学话语就如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而摇摇欲坠,其内在映射的不过是人们主观想象世界的形而上学心路,而真正把批判的武器运用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上面,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到了。正如柯尔施所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可以被总结如下:首先,他通过哲学批判了宗教;然后,他通过政治批判了宗教和哲学;最后,他通过经济学批判了宗教、哲学、政治和所有意识形态。”<sup>[8]</sup>简言之,批判性贯穿了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始终,从唯心论批判到黑格尔、费尔巴哈批判,从形而上学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异化理论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手术刀无情地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千疮百孔的病体,

探索人类彻底解放的路向,鲜明地彰显了其思想精神的革命性、超越性和质疑性。

如果按照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的二分定性与归纳阐释的标准,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都可以称之为非批判哲学,即一种源于笛卡尔的、以经验科学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知识体系,它表征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简单认同和自觉并轨。只有马克思掀起的哲学革命才真正确立了批判性哲学的一整套独立的理论立场、思想路径与运作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明显区别在于其实践批判性。他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他们消融到‘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他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sup>[9]</sup>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特质等同于一种实证逻辑的价值指向,蜕变为由客观知识形态简单堆砌的形而上学,矮化为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推理手段,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精神的褪色与遮蔽。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科学逻辑论的哲学截然不同,前者是批判的、质疑的、寻求人类解放的哲学,后者是归类的、认同的、维护现代性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虽受益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滋养,但“黑格尔体系中的一切范畴都终结于现在的秩序,而马克思的体系中,一切范畴都意指对这一秩序的否定。……马克思体系中的一切概念都是对整个现存秩序的一种控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一门‘批判的’理论。”<sup>[10]</sup>

认知传播学透析卢卡奇、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吸收与发扬,并不简单地认同人类感官和心智物化为“透明之镜”照射现实的可视化结果等观于人认识世界的合法过程,即一种“我看故我在”的必然书写。而是把其升华为

一种“哲学之镜”，即视之为一个繁杂、复合性的认知加工体系，并进而赋予为人们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希冀通过以人为中心的实践活动，以人类心智为信息加工平台的主客观聚合路径，相对真实和尽量完整地去反映事物与存在，从而探索人类社会精神交往的一般化规律。

认知传播学承认事实信息传播中的本源作用，以人的感官、运动系统对对象的直接体验和间接体验构成其立论的基本前提，但这并不自然导致一种对科学实证化和经验具象化的默许。恰恰相反，认知传播学反对狭隘僵化的经验式、实证式、科学式的知识论站位，提倡一种批判的、人学的、历史的辩证理性，并认为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这么一种反思路向、精神矫正，只要依托于一种合理的衍义性结构和外在的规律性语境，它必将成为一种有效的、正确的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 三、问题导向

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体现为一种问题意识和矛盾思维模式，即认为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的运动中，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强调在解决矛盾中推动事物的发展。与其批判话语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非常注重对其丛生的矛盾和异化问题的批判，如对资本主义宣扬的民主、自由、法制虚假性的批判，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诟病，对资本主义人权解放虚伪性的针砭，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鞭笞，对劳动与剩余价值真实关系的揭露。马克思在谈到时代精神与哲学的关系时，强调了“问题就是口号”，并认为问题的提出比答案的揭晓更有意义，“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sup>[11]</sup> 马克思批判的矛头不仅仅对准资本主义社会，更延展至对现代性本体与身俱来的诸多问题，如工具理性、市场竞争、资源匮乏、社会加速、关系异化等的诘难与问责。这种问题导向的解

构范式一百多年后为后现代主义所继承深化并广谱运用，形成了一个从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到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再到语言批判的空间蔓延过程，<sup>[12]</sup> 并由此引发了后来者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谱系“家族相似”的一系列假设与论证，型构了繁复的后现代知识生产进路与多样化的理论精神题域。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一切文明的进步无不是问题导向的结果。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变革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sup>[13]</sup>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传承发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典型体现，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科学严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思想大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根本遵循，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认知传播学作为一个思潮或学派的出现就是一种问题导向引发的托勒密式变革。众所周知，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一直以来被经验的、实际的、可视的、透明的客观主义分析逻辑所宰制，施拉姆以及他着意擘划的四大奠基人（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勒温）无一例外地把“效果研究”作为其核心旨趣，这直接导致了现代性思维框架下传受的二元简单划分，忽略了人的主体作用，有意无意地抹去了个性化的理性思辨与外在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对事实建构的影响。其后，虽然欧陆批判学派、英国文化学派等试图重塑人在传播中的主体地

位,但依然因其理论的悬搁、概念的缺位和逻辑的断裂而无力自证合法和完形其框架。

实际上,目前传播领域的诸多学者和业界精英都意识到经验主义传播模式的弊病与短板,已经开始从具体的问题和现象入手,逐渐重视沟通技能、宣讲态度、知识水平、社会文化背景等对事实形成的影响,力图从多向度的立场和视阈重新阐释传播的分层化与复杂性。如国外正在兴起的所谓建构式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就是一种基于具体的问题导向而对客观主义新闻学展开的反思和批判。它标示了以解决问题为旨归的一类报道的规模出现,也是对日渐冒头的小报化、情绪化和消极化资讯的反击,意在为用户提供一种公平、准确和语境化的世界观,而非刻意强调社会消极面和事情的错误指向。正如《卫报》特别项目总监所说的那样,要让记者意识到“我们并非只是社会的镜像——如多数记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塑造这个世界,偶尔需要对可怕的事件进行引导,比如酗酒、自杀、犯罪,以避免社会的不当扩散和模仿效应”<sup>[14]</sup>。建构式新闻的出现,明显是对只报道事实而不关心价值引导的传统新闻范式的拷问与革新,高蹈了心智、情感、背景、环境等隐藏因素多维度影响新闻事实,正向调控社会舆论的核心旨趣。与建构式新闻的发轫初衷和价值指向不一样的是,认知传播学的问题导向并非仅仅局限于对某种具体的社会问题或现象的反思,而是在总括的意向和一般规律的层面上对传统经验(实证)传播范式的补缺和延伸,即既强调客观事实的本源和基础作用,承认人的身体体验带给我们的认知前提,又凸显了人的心智依托于不同的辖域、背景、视角、立场等对客观事实进行理性加工与辩证衍义的内在机制。这就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克服了主客观的渐离与疏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递延与活用。

#### 四、主体拟构

主体性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哲学追问探讨

和激烈争辩的一个专业化范畴。一些学者把现代西方哲学分成主体哲学、无主体哲学和反主体哲学,在他们的视阈中,主体哲学属于一种以人的本质、状况或超验存在为动机的建构哲学,如唯灵论、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等等;无主体哲学是以现实问题、意义价值、语言现象等取代主体研究,如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英美分析哲学等等;反主体哲学则利用结构和功能来消解和摧毁主体,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sup>[15]</sup>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主体哲学,但它与其他主体哲学不一样的是,它把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结合起来,彻底反对和拒斥虚无主义与唯灵论,一切以“我”为中心,把人类实践作为认识基础去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型构了实践——生存——意义的题域序列,实现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辩证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主体之维既来自于其必然秉持的哲学立场,又来自于其关于人的自我发展、社会健康衍进以及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终极理路。

在马克思的迭代影响下,梅洛·庞蒂继承并延展了其人本主义思想,把人的心智具象化地比喻成探照灯,指出它的光线只照亮已经给出的物体,并且这个物体在先验中只为我们而存在,这就强调了言语行为中主体的选择性和决定性。更进一步他认为,“意识的生活——认识的生活,欲望的生活或知觉的生活——是由‘意向弧’支撑的,‘意向弧’在我们周围投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人文环境,我们的物质情境,我们的意识形态情境,我们的精神情境,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置身于所有这些关系中。正是这个‘意向弧’造就了感官的统一性,感官和智力的统一性,感受性和运动机能的统一性。”<sup>[16]</sup>但是,梅洛·庞蒂忽视科学知识在人们观念形成中的核心功效,过于夸大了知觉在认知世界中的作用,把人的体验感知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他的现象学逻辑以存在主义为基础,在强调人的主观体验的同时,他试图克服存在与意识、自在与自

为、主客体之间的背离与互斥,建立一个从知觉现象入手解释人类认知世界总体规律的理论体系。

深受梅洛·庞蒂思想影响的体验哲学创始人雷科夫和约翰逊在批判和反思第一代认知科学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体验三原则,即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隐喻性和认知的无意识性,以重申人的主体决定作用。他们认为,人的心智与身体不可分离,这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称之为意识的东西不过是人的身体机能与行为基于自身所处情境对人类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折射。心智并不是基于人类先验的神秘抽象的存在,而是我们与世界交往互动的必然结构与型制的一部分。<sup>[17]</sup>我们认为,雷科夫与约翰逊的体验三原则可总归为体认原则,它既包括唯物主义的聚焦人的实践指向,又涵盖了基于个体意识的认知加工,这可以普遍应用于人类精神活动的深远领域。

认知传播学正是沿着从马克思到梅洛·庞蒂,再到雷科夫和约翰逊的这一哲学谱系,在分析和拷问人类传播问题和现象中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尤其是强调了心智加工的差异化作用,力图超越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传统学理,对传播研究的主客观二元背离和微观范式的一体化规制进行纠偏。认知传播学批判了传统经验的主客传受模式,不再把传播过程看成是主体发出信息、客体被动接受的非选择性行为,但也不仅仅停留在受众对传者产生反馈和能动的简单逻辑上,而是既凸显了客观事实存在的基础性、人类理解的体验性,同时又突出了人的心智在认知世界的探索中与多重因素积极互动的“活跃的主动性(active subjectivity)”。认知传播学的主体引领据有一种典型性全方位互动的观点,这既坚持了人本主义原则,又形成了“体验性概念化”和多重互动兼顾的“拟构”观。语言学家王寅指出,人与客观世界的彼此互动是形成部分概念、范畴、意义的基础,<sup>[18]</sup>由此出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理解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人与各种

媒介的互动是后真相时代智能化与主体性趋势并行的核心进路;文本与客观存在的互动是前提真实与拟构发展的辩证统一;媒介之间的互动则是媒介生态开放性、多样化和彼此约束的必要前提。

在时空双重虚化的脱域(disembodying)机制影响下,现代社会中主体的活跃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但这种激化与内爆并非简单化为一种摆脱了客观事实“沉重的肉身”的肆意妄为,也不能形塑为诸如后现代主义语言学家兰盖克等对概念和意义过于主观性和自我化建构的那种范畴言说、对主体间性的随意泛用与广谱题解,而是受限于“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铁律和多种关系、多种因素相互联动、此消彼长的场域牵绊,故此,这种活跃的主动行为实际上体现为一种“有限的主体性(limited subjectivity)”。

## 五、诉诸自然

前面述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主体哲学,但在马克思的思想大厦中也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先在性及其标引意义。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sup>[19]</sup>同时,人的思维是由各种各样的大脑所提供的,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有可能产生谬误和差错,因而“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能达到的认识上的至上意义……,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来看,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是总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sup>[20]</sup>更进一步,恩格斯得出了这样的观点,“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

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sup>[21]</sup> 为了避免作为主体的人的错误意识对认知世界的干扰,恩格斯晚年创立的自然辩证法体系强调了科学与哲学的内在融合,摒弃了自在理性的一意孤行。其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新发展的背景下,列宁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提出了“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的著名论点。这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和反思,即作为一种方法论,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进程中,常常要撇开易产生谬误的主体,不把客观世界局限于纯思想的范围之内,而是通过把主体设想为意识的产物而确立其独特的存在方式,<sup>[22]</sup> 站在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总图景维度去探讨各种运动的划分、联系、交错、转化等问题,进而追求认识世界的丰富性与完整性,确乎可以开启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新向度。

卢卡奇认为,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如果没有真正对立的、克服直观映射的实践原则,就是虚无缥缈、自我臆想的主体编织的迷宫。主体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完满性,只有回归实践,把“意识的自发结构”作为这种诉求的依托物,才能反哺原生本位、召唤真正的主体,实现对工具理性弥漫的“物化社会”所有细胞的全面批判与彻底清洗。梅洛·庞蒂承续了胡塞尔与卢卡奇的相关观点与思路,开创了存在主义现象学,提倡一种野性的存在与野性的思维,并进而把人的身体、物理意义上的肉身作为探知现实世界和存在的入口,认为人类正是通过这个出发点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去延伸、存续和重构人的身体体验与描摹世界图景之间的机制耦合。<sup>[23]</sup> 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实现了主体理性向客观存在的变异,并通过客位的反哺重新升华为真正的主体,引领了结构主义的野性辩证法运动及其理论回望。

在现实中,认知传播学的研究路径也受到后现代视角,尤其是德勒兹所谓主体非中心化的影响,以及意旨明确的非神秘化现象学立场的启

发,滋生出一种反弹琵琶、从传播主体溯向客观对象的回流路径,即不是“我主导传播”,而是“传播中的我”的这么一种客位反哺的阐释模式。这恰如在浪漫主义时代,古希腊流传着这么一种信念,即诗人须得有神灵附体,有所谓“诗的狂乱”,才能写下不朽的诗篇。也就是说,是另外一个伟大的灵性在通过诗人说话,而不是诗人自己在说。<sup>[24]</sup> 我们把这种消解主体的书写模式移植到传播学研究中便是后真相时代的一场结构主义革命,这正好对应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卢卡奇、梅洛·庞蒂、雷科夫和约翰逊以降这么一种现象学的朴素逻辑:主体因为向客观对象成功的迁移而形成了更丰盈、更完满、更强大的批判主体,这有助于全面摧毁工具理性与物化社会的理想化目标的实现。

在全球化语境下,现代科技手段使人们更易于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进行千头万绪的事实判定与价值评说,但解蔽的同时,也意味着遮蔽,我们对真相的了解将会越来越难。同时,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传播的主体也更容易犯错误,常常会形成主观原因或客观环境造就的遮蔽事实真相的言语行为方式,目前在业界频繁出现的所谓“反转新闻”即是一剂明例。这让我们认识到,由于传播主体认知能力的差异或多种因素对信息流过程施加的影响,谣言、假新闻、不成熟新闻、非整体性新闻等的出现在所难免。这个时候我们提倡建立一种主体向崇高客体的靠近以解放主体自身并形成新的强大主体、诉诸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的认知路径,以避免人类对理性的过度依恋与迷信,从而走出启蒙弊端规设的泥潭。正如齐泽克所言,一旦理念的辩证过程不再受理念自身的完整性驱使,一旦它无法对它自身的概念作出回应,完整的理念就需要外在的大对体——自然——来维系其自我调停的循环,即一种完整而封闭的循环。<sup>[25]</sup> 也许,要绕开黑格尔式理论体系无人驾驶却自我翱翔的误区,后真相时代的传播过程在主体的求真模式上,同样渴求并必需依托于自然界规律的观照,并在自然科学的

新发展和新技术、新思想的催化下,实现对客观事实和价值图景的接近与回归。这个自外而内的巡游过程就是向齐泽克所言“大对体”的靠拢和聆听,也即是对恩格斯、列宁强调的“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和“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一种遵循和顺应。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笛卡尔的方法论虽然彰显了以具身体验来怀疑一切的批判精神,并对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他过于强调了身与心的分离与问题简单化的机械解剖理路,存在着与身俱来的短板与缺点,康德与黑格尔则因其自我拟定的先验理性的牵引而深陷于形而上学的沼泽无法自拔。唯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脱胎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与当代中国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了高度的理论思维、复杂的辩证思维、精准的战略思维和发展的创新思维,真正确立了总体的立场、系统的视角和有机的进路,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本文从五个方面总结了认知传播学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即总体原则、批判视阈、问题导向、主体拟构和诉诸自然。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五个维度的划分并非截然分开或逐层运行的,应该说,五种方法论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依存,交相辉映,彼此观照,形成一个联系的整体,在线性的演进和空间的转换中不断诠释着人类社会层出不穷的传播问题和现象,折射出了精神交往活动的规律性、复杂性与变异性。

###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17页。

[2][24][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86、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4][5]董振华:《治国理政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时报》2016年9月12日。

[6]孙承叔、韩欲立、钱愿诚、罗富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7]郑渝川:《知识融通为何成为大势所趋》,《解放日报》2016年10月15日。

[8][美]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7页。

[10]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7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12]邢荣:《马克思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41页。

[13]贾立政:《在坚持问题导向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7年9月14日。

[14]腾讯传媒:《News全媒体采访与写作》,2018年11月6日。

[15][23]李鹏:《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88、204—205页。

[16][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81页。

[17]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1999, p.266.

[18]王寅:《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哲学动态》2009年第10期。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20][21]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40页。

[22]衣俊卿主编:《新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25][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16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